

南史学丛书



近代中国 历史与文化的探索

曾光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暨南史学丛书



近代中国 历史与文化的探索

曾光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探索 / 曾光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 - 7 - 5203 - 0928 - 8

I. ①近… II. ①曾…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IV. ①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994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芳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近代以来，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变化囊括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变化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正是吸引我这些年致力于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缘由。对这个变化的研究，既要去探析历史变化中的种种细节、关联及过程，还要力图去发现这种变化中所潜藏的流变趋势。对历史发展变化轨迹的梳理不仅体现出研究者对历史本身的理解，也会在这种梳理中或明或暗地展现出研究者对历史发展走向的理解。历史中包含未来的因子，不管是研究者还是阅读者，都可以在历史的研究或阅读中体味到过去、现在与将来的种种关联，这也正是历史研究或阅读的魅力所在。

我并不试图在自己的文章中去展示历史发展的趋势或规律，只是借这次结集出版的机会，在梳理自己旧作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写过的文章也有阶段性的特征。先是注重历史人物与学派的研究，近年来则开始注重社会思潮与学术文化的研究，想必思想与文化会成为我未来研究的一个内容。近代以来的有识之士多将思想文化层面视为中国社会嬗变的关键所在，我近来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无非是在近代先贤构想好的路途上勉力前行。

本书是本人多年来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结集。由于选入的论文多以近代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为主题或与之相关，故将书稿定为现名。其中《康熙〈东莞县志〉中的“祥异”与“忠烈”》一文虽以康熙年间的《东莞县志》为研究对象，但在写作时也涉及宣统年间的《东莞县志》，故一并纳入到本书中。

从选入的论文看，我自从事历史学研究以来，研究的具体领域主要集中在桐城派研究、吴汝纶研究及近代中国文化演变研究。我于桐



城派研究、吴汝纶研究已分别有专著出版，其研究也算暂时告了一个段落。于近代中国文化演变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也不成系统，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出更多的成果。

2017年2月20日于暨南大学

目 录

戴名世与桐城派关系辨析	(1)
晚清桐城派嬗变的文化轨迹	(13)
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	(23)
桐城派的传承与传统教育	(32)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45)
曾国藩与“桐城中兴”	(60)
桐城派的宿命与新文化运动	(73)
《汉学商兑》学术批判方式探析	(88)
吴汝纶对中西文化兼容的独特思考	(107)
吴汝纶“存废”中医的文化选择	(119)
吴汝纶与中国近代教育转型	(133)
历史文化名人与顺德的城市文化记忆 ——以简朝亮为陈述中心	(144)
从近代化的演变轨迹看当代广东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153)
从近代中国文化演进的轨迹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	(164)
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圈的裂变与式微	(175)
近代学人关于国学书目及大学国学教育的思考	(186)
梁启超“广中国历史研究法”探析	(200)
论梁启超的维新教育思想 ——以《变法通议》为研究中心	(209)
麦孟华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及其对外思想	(218)



细节与趋势

——关于甲午战争的观察与思考	(240)
再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	(246)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及失控缘由探析	(255)
康熙《东莞县志》中的“祥异”与“忠烈”	(267)

戴名世与桐城派关系辨析

戴名世（1653—1713），安徽桐城人，字田有，一字褐夫，又称南山先生，清代学者为讳其名，又称他为“宋潜虚先生”。因其著作《南山集》“语多狂悖”^①，而遭文字狱之祸，康熙五十二年（1713）被处死，时年61岁。

由于戴名世生前曾与桐城派开创者方苞来往甚密，故戴名世是否属于桐城派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将在回顾戴名世与方苞的关系及其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关于“戴名世与桐城派”研究的学术回顾

在论及“戴名世与桐城派”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时，学界目前有两种相反的观点：

一部分学者认为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先驱，如王树民在《戴名世集序》中认为：“戴氏年长于望溪，与之同执文坛牛耳，后因《南山集》案发，导致身败名裂，书亦遭毁禁，然其在文学方面之影响，则久而弥固，故以戴氏为桐城派之先驱，绝非过分之言。”^②陈平原也认为应该将方、戴并称，他认为：“戴也是桐城人，长方苞十五岁，也以能文著称，谈桐城派，本该戴、方并称才是。”^③

而有的学者则以为戴名世仅是桐城人而已，与桐城派无涉。如王

① 苏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谱》，《方望溪全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442页。

② 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页。以下《戴名世集》不再标编校者。

③ 陈平原：《文派、文选与讲学——姚鼐的为人与为学》，《学术界》2003年第5期。



献永认为：“戴名世只能是桐城人的戴名世，而非桐城派的戴名世。”他提出的理由有二：一是桐城派的形成是在戴名世死后；二是戴名世具有强烈的反清意识，与桐城派成为鲜明对比。^① 这种观点与笔者所持观点基本一致，但作者未展开论述，甚为遗憾。

法国学者戴廷杰则完全不认可戴名世与桐城派有关或戴名世是桐城派先祖这样的观点。由于戴廷杰集数十年之功编撰了近千页的《戴名世年谱》，故他的观点很值得注意。戴廷杰认为：“如果只是从各学者所依据的文学理论而论，戴名世是否属于桐城派是很难证明的。其实是无法证明的：怎可能证明一个作家属于他所生活的年代还不存在的一个流派呢？这并不是说提出这种问题毫无意义，我只是觉得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这几乎是年代记述的误差。最后我要补充一点：提出这种问题，还是慎重为妙。”^② 戴廷杰认为桐城派的产生是在戴名世去世后很多年的事情了，故戴名世是否属于桐城派这个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戴廷杰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问题的本质，但他回避了戴名世与方苞曾有密切往来这一关键问题，故其回答缺乏说服力。

笔者认为：因戴名世生前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交往密切，故许多研究者将戴名世视为桐城派的开创者，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但客观而论，戴名世与桐城派的创建并无关涉，戴名世不是桐城派的开创者。戴名世只是一位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有着密切往来，并持有相近文学、学术观点的桐城籍学者。为了全面说明问题，有必要先对戴名世与方苞之间的关系作必要的回顾。

二 戴名世与方苞的关系回顾

“戴名世与桐城派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产生，其实与方苞有着密切关系。方苞通常被视为桐城派的创始人，由于戴名世生前与方苞关系密切，两人常以古文相唱和，这种特殊关系容易使人将戴名世

① 以上见王献永《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6—33页。

② 高黛英：《法国汉学家戴廷杰访谈录》，《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与桐城派联系起来。故对“戴名世与方苞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回顾对于诠释“戴名世与桐城派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对于戴名世与方苞关系的回顾，须从《南山集》案谈起。

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上疏，参劾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名世身膺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版。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①赵申乔上疏引发了当时震惊全国的《南山集》狱案，被诛戮者甚多。桐城贡士方苞因为《南山集》作序亦被牵连。客观而论，戴名世并无反清之意，只是他在《南山集》中提出清朝应从康熙元年算起，触犯了时忌。戴名世最终因《南山集》案被处斩，方苞则躲过一劫。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蒙赦出狱，以白衣入值南书房，为文学侍从。历康、雍、乾隆三朝，曾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任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

方苞所以被《南山集》所牵连，源于他与戴名世的关系。两人于康熙三十年（1691）在京师同贡于太学相识，其后近二十年，两人交往甚密，在颠沛的生涯中，互为知音，于古文创作相与切磋亦相互推崇，并盛名于时。

方苞与戴名世相识时，戴名世39岁，方苞24岁。两人之间十五岁的年龄差异，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即年长的戴名世与方苞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师生关系。其实，学问高低与年龄长幼并无必然联系。仔细考察，方苞与戴名世之间应该是“学友”“同学”之间的关系而非“师生”之间的关系，其理由如下：

其一，两人最初相识是在京师太学，其最初关系当是一种“同乡”兼“同学”关系。

戴名世称自己在“丙寅、丁卯之间”即贡于太学，丙寅年为康熙二十五年（1686），丁卯年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方苞则于康熙三十年八月至北京，肄业太学。关于两人的认识过程，戴名世在《徐诒孙遗稿序》中曾有记载：“当丙寅、丁卯之间，余与诒孙（即徐念

^① 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3页。



祖——笔者注）先后贡于太学，太学诸生与余最善者莫如言洁（即刘齐——笔者注），诒孙则仅识面而已。而诒孙最善方灵皋，灵皋与余同县，最亲爱者也，诒孙介灵皋以交于余。而灵皋介余以交于言洁。此数人者……务以古人相砥砺，一时太学诸生皆号此数人为‘狂士’。”^①从戴名世的这段叙述，可见他与方苞是在同贡于太学时认识的。由于方苞是康熙三十年才入京师太学，故方苞与戴名世的认识时间不会在康熙二十五年或二十六年，而应在康熙三十年左右，方苞就曾具体指明了他与戴名世认识的时间是在“辛未秋”，辛未年即康熙三十年。^②

从戴名世所用的“最亲爱者”一词，可见他与方苞的关系确实非同寻常。既同为贡生，两人之间也就是“同学”的关系，方苞为戴名世《南山集偶抄》所作序言的落款就为“同学方苞书”。

戴、方二人一见如故，方苞在初到北京的日子里几乎只有戴名世一个朋友。当戴名世于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因祖父病逝离京返家后，方苞郁郁寡欢，他在《送宋潜虚南归序》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觉：“（戴名世）以其大父之忧，卒卒而东。然则余向之所乐于京师者，渐以无有，知余志者益希，余岂能郁郁于风沙粪壤中，与时俗之人务为浮薄哉？开口而笑，则人以为笑，举足而步，则人以为迂，余亦何乐乎此哉？”^③

其二，两人相识后在学问上“互相师资”，其关系逐渐从“同学”关系深化成“学友”关系。

戴、方二人所以能成为知己，当然不是仅源于“同乡”“同学”关系那样简单。学识上的意趣相投，对古文的喜好，当是两人友谊不断延伸的重要因素。两人相识后时以古文相切磋，戴氏曾说：“盖灵皋自与余往复讨论，面相质正者且十年。每一篇成，辄举以示余，余为之点定评论，其稍有不惬于余心，灵皋即自毁其稿。而灵皋尤爱慕余文，时时循环讽颂，尝举余之所谓妙远不测者，仿佛想象其意

① 戴名世：《徐诒孙遗稿序》，《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页。

② 王树民等编校：《戴名世遗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6页。

③ 方苞：《送宋潜虚南归序》，《方望溪遗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81页。



境。”^①戴名世还称自己与方苞未见面时即“遥相应和”，见面后“互相师资，荒江墟市，寂寞相对”^②。方苞在为戴名世的《南山集偶抄》作序时，称戴名世为“吾友”，在戴氏去世后，方苞又称戴名世为“亡友”^③，显然视其为朋友。

其三，《南山集》案发前，方苞就以古文名动一时，其文名甚至上达于康熙皇帝。戴名世《南山集》请方苞作序之举，更足以说明方苞在当时古文界的影响甚至在戴名世之上。

方苞在《南山集》案后，所以能得到赦免，很大程度上就缘于他在古文界的广泛影响。据《清史稿》载：“桐城贡土方苞坐戴名世狱论死，上偶言及侍郎汪霨卒后，谁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笔者加注，下同）苞得释，（隶汉军旗，以白衣）召入南书房。其扶植善类如此。”^④从李光地回答康熙帝的话可看出方苞当时在古文领域已具有无人可以企及的地位。另一条史料也可以佐证，《清史稿》的相关记载，康熙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朱批有如下记载：“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足见方苞在戴名世案发前即已名动文坛。正是借助于这种文学地位与成就才使方苞摆脱了血光之灾，意外地踏上了一条青云直上的坦途。

笔者于此反复强调年轻时代的方苞在古文领域的成就与地位，其意还是在说明方、戴二人之间虽有年龄长幼之别，却无学问高低之分。既然戴名世与方苞之间是一种同学、学友关系，且方苞在当时文坛的影响之大无人出其右，自然也就不存在方苞的古文之学“师承”于戴名世的问题。

《南山集》案将方苞与戴名世两人的关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固定下来。正是由于方苞与戴名世的特殊关系，加之两人在学术、文学观点等方面的一致性，故一些学者在视方苞为桐城派创始者的同时，又

① 戴名世：《方灵皋稿序》，《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页。

② 同上书，第53、54页。

③ 方苞：《书先君子家传后》，《方望溪全集》，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参见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④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3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99页。



视戴名世为桐城派的“先驱者”或“先行者”^①。梁启超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戴名世“本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推他为开山之祖”^②。从学派传承的角度看，如果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开山之祖，方苞就当是戴名世的弟子了，从上面笔者的分析，这个结论似乎不能成立。

三 衡量一个学派先驱者的标准

衡量一个学者是否为一个学派的开创人，当具备以下条件：其一，是否在某一领域具备系统的、自成一家的学说。其二，是否通过师承等学术传播交流方式逐渐形成一个有一定规模的、持相近学术观点的知识群体。其三，这个开创者的学术观点与学派的开创地位是否得到这个知识群体的普遍认可。

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显然符合这个标准的三个条件。按此三个标准衡量，戴名世只能算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与桐城派的开创者并没有干系。

其一，方苞的“义法”说为桐城派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方苞“义法”说的提出与成熟是戴名世去世以后的事情。

方苞于桐城派开创的最大贡献就是“义法”说，“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的理论核心。“义法”说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义”，“义”即文章的思想意蕴，它应以儒家的伦理道德特别是孔子的《春秋》之义为根底。二是“法”，“法”即文章的外在法则，它讲求体要规制，虚实详略，须体现《春秋》的褒贬笔法之意。三是“义”与“法”的关系，“义法”即是“根据义理去判断、取舍内容而如何将其表达于文字的方法”^③。

① 参见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魏际昌在《桐城古文学派小史》中则将戴名世称为桐城派的“先行者”（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75页。

③ [日]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杨铁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方苞作为古文家，十分强调文章之“法”，他曾说：“此虽小术（作文之法——笔者注），失其传者七百年，吾哀甚矣。”^①与当时学者普遍对文章家轻视的看法相反，方苞对古文家予以了很高的评价：“艺术莫难于古文。自周以来，各自名家者，仅十数人，则其艰可知矣！苟无其材，虽务学不可强而能也；苟无其学，虽有材不能骤而达也；有其材有其学而非其人，犹不能以有立焉。”^②对作文之“法”的强调，其实也就是对文章家地位的肯定。方苞的“义法”说，就是要树立古文以及古文家的独立地位，以期古文家能与当时独霸学坛的宋学家、汉学家鼎足而立。

方苞虽早年与戴名世交往密切，于学问上互有浸染，但方苞“义法”说的提出与成熟却是在戴名世去世的若干年后了。《南山集》案发在康熙五十年，方苞提出“义法”说则大致在康熙末年，^③其古文理论的最终成熟是雍正年间的事情了。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编成示范“义法”的古文读本《古文约选》。《古文约选》的颁行，对于桐城派的创立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义法”作为方苞为古文一派奠下的理论基石，为桐城派代代相传，影响深远。同时，作为方苞一家之言的“义法”说，随着官选文本《古文约选》的颁行，获取了某种官方权威文化的身份，广为传播。其次，方苞通过编选《古文约选》，试图以古文旁通于时文，此举对于桐城派意义甚大，“正是通过士子之学的渠道，方苞的义法说及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才获得相当的知名度和广阔的植被地带”^④。

文集、文选是中国传统学派创始人的思想得以不断传承、扩展的一个重要媒介。方苞所选编的《古文约选》是八旗子弟教本，《四书文选》则是奉旨所编。这两本文选的广为印行，使桐城“义法”得以广为传播。与方苞所编文集相比，戴名世《南山集》的命运就是

① 方苞：《答程夔洲书》，《方望溪全集》，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② 方苞：《答申谦居书》，《方望溪全集》，第81页。

③ 参见许福吉《义法与经世——方苞及其文学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④ 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天壤之别了,《南山集》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受到政府的严密追查销毁,使戴名世的文风、思想都不可能在当时产生影响,而这一百年正好是桐城派发展的巅峰时期。

《南山集》案是清代的一大文字狱。是案发生后,戴名世不仅被斩,他的文集也被收缴销毁。清政府对《南山集》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清剿。第一次是在《南山集》案发生后的大规模收缴。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两江总督噶礼奏报拿获〈南山集〉序作者及其刻版等事折》云:“窃查戴名世案,撰拟南山集序之进士方苞,原系巡抚张伯行至交……顷由刑部言:行文令江宁、安徽二巡抚,查拿方苞等及其所刻《南山集》版……方苞隐藏《南山集》刻版,刷印买者甚多……至于所刻《南山集》版,奴才交付由部所遣之人带回。”^①第二次是《四库全书》编撰时期对民间残存《南山集》及戴名世所编文集的清剿。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谕旨各省督抚,“将可备采择之书,开单送馆”,这是清政府对学术著作的一次大规模清点,凡是有诋毁清朝之嫌的书籍被统统收缴销毁,戴名世的《南山集》也不例外。法国学者戴廷杰在其编纂的《戴名世年谱》中详细收集了这一时期各地收缴《南山集》的情况。现据《戴名世年谱》将当时各地收缴戴名世文集的情况汇集如下: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日,两江总督进呈《戴田有文集》二十三部,《戴田有全集》板一副。八月廿二日,两江总督进呈《南山集》一部、《戴田有全集》七十七部。

乾隆四十三年,湖广总督进呈《戴田有时文》十一部。十月初四日,湖广总督进呈《南山集》一部、《戴田有时文》十六部。十二月,江西巡抚进呈戴名世《园文集》。

乾隆四十四年,江西巡抚进呈戴名世所撰《忧庵集偶抄》,四月八日,江苏巡抚进呈《南山集偶抄》两部。四月二十日,山东巡抚进呈《戴田有四书文》三本。七月初九日,两江总督进呈《戴田有集》一部、《予遗录》一部。九月初六日,闽浙总督进呈《戴名世时

^① 《两江总督噶礼奏报拿获〈南山集〉序作者及其刻版等事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9页。



文》四部。十一月，湖广总督进呈《南山集》。十一月初一日，湖广总督进呈《戴田有时文》十部。

乾隆四十六年，江西巡抚进呈《戴田有时文》十七部。五月，浙江巡抚进呈《南山集》。六月十五日，直隶总督进呈《戴田有文稿》八部。九月廿八日，云南巡抚进呈《戴田有时文》一部。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贵州巡抚进呈《戴名世时文》六本。二月三十日，闽浙总督进呈《南山集》一部、《戴田有文稿》二十八部。八月廿八日，闽浙总督进呈《忧患集》二部、《予遗录》一部、《戴田有文稿》四部。十月，浙江巡抚进呈《南山集》。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浙江巡抚奏缴《戴名世时文》二十四本。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初七日（1790），浙江巡抚奏缴《戴田有时文》四十本。

由上可见，从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案发，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事隔已近80年，清政府还在追缴戴名世的各种文集，笔者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戴名世文集被收缴的情况，就意在说明，起码在1711年以后的近一百年里，戴名世是一个被压制、被遗忘的人物。恰如其邑人戴兴在《潜虚先生墓表》中所云：“先生歿，同游诸君子以其获罪，当时遂无复敢道先生为人行事，浸寻日久，渐就湮没。故先生名在四方，而其著述行为，家世里居，鲜能言其详者，再经数十年，将遂泯灭无闻。”^①

其二，方苞的许多弟子不仅是古文大家，还多有功名。这种成员构成的学术梯队对于一个处于初创时期学派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既可以使古文理论继续深化成熟，又可以不断扩大古文理论影响。

方苞培养的弟子以刘大櫟的文学成就最高，刘大櫟29岁时入京，以文拜见同乡方苞，从此“师事方苞，受古文书法”^②，成为方苞的得意弟子。刘大櫟对方苞的理论有所继承、吸收，更有创新、发展。刘大櫟在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神气”“音节”“字句”的文

^① 戴兴：《潜虚先生墓表》，转引自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91页。

^② 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37页。



章要素论，使桐城派古文理论更为完善成熟。正是刘大櫟于古文理论的独特贡献，故他又被视为桐城三祖之一。桐城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姚鼐在12岁时即拜刘大櫟为师，学习古文。^①方苞、刘大櫟、姚鼐这三位前后相继的大师是桐城派得以最终创立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刘大櫟、姚鼐等人的努力，桐城派也难成气候。

方苞其他的出色弟子还有雷铨（1697—1760）、沈彤（1688—1752）、王又朴（1681—1760）、沈庭芳（1712—1772）、王兆符（1681—1723）等人。这些人多有功名与官职，其中雷铨是雍正癸丑进士，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又朴为雍正癸卯进士，官庐州府同知；沈庭芳曾官山东按察使；王兆符为康熙辛丑进士。政治地位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学术派别扩大影响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这些具有功名的弟子围绕在方苞周围，在文坛上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扩大了古文义法在文坛的影响。

戴名世因《南山集》案被杀后，其门生或流放边陲或入籍为奴，其文集被查抄焚毁，学者们都不敢轻提其名，而以“宋潜虚先生”代称，唯恐触忌。在清代严密的文网下，哪个学者还敢传承戴名世的思想，更谈不上什么文派、学派会推戴名世为先驱了。戴名世及其《南山集》随着戴名世的被杀从此成为清代历史上一个文化遗迹，他的思想没有通过师承等方式进一步传播、传承，故戴名世不在桐城派自方苞到刘大櫟、姚鼐一线的学术传承链条上。从清代康熙、乾隆两朝酷烈的文字狱及戴名世文集几被追缴殆尽的文化背景看，戴名世不可能是清代兴盛一时的桐城派先驱。

桐城派后人无人视戴名世为其文派的开创者，都视方苞为文派的开创者。姚鼐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是宣告桐城派成“派”的奠基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姚鼐就只字不提戴名世，而是直接从方苞写起。自称“尝亲炙侍郎”的沈日富也说：“康熙中叶，海内治安，士皆诵习经子，研精性理，望溪方氏出而文章一轨于中正，自是

^① 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较为详细地说明了自己拜师刘大櫟的过程（参见刘季高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15页）。